

明
镜
评
论

■张永琪

《社会保险法(草案)》已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该草案规定,涉及累计缴费年限的养老、医疗、失业三险关系均可随本人转移,缴费年限或分段或累计计算,全国统一的个人社会保障号码即身份证号(据新华社)。

三险关系可以随同本人转移,这是社保法草案的最大亮点。参保人员的养老保险关系可以转移接续,跨地区就业劳动者就能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,其参保积极性应该会有很大提高;而基本医疗保险关系和失业保险关系可随本人跨地区转移,则可给参保者异地就医和失业后生活带来方便、提供保障。这些都散发着人性化的光辉。

不过,社保法作为一部涉及所有劳动者利益的重要大法,其精髓不应该只有这些,至少还应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:

让景区有底气
拒绝“免费旅游”

■胡艺

12月28日,福建莆田市瑞云山景区副总经理官文玉、办公室主任余家德仍然全身疼痛。前一天,他们在制止一群自称是“莆田市城管执法人员”而不愿买票的游客进景区时,与对方发生肢体冲突而受伤。对此,莆田市城管局一副局长称,该局工会组织的旅行团中,确有成员因门票问题与瑞云山景区人员发生冲突(12月29日《东南快报》)。

毋庸置疑,强吃旅游“霸王餐”、殴打景区人员的城管,应该受到谴责与查处。笔者也相信,该事件曝光后,有关部门会给景区一个说法。但是在我看来,“城管”只是该事件的一个关键词,其扯出的公务人员免费旅游的话题更值得关注。表面上看,景区奉行“免票潜规则”,把方方面面“关系户”照顾妥帖,可以为景区营造出良好的“发展环境”,但其危害显而易见。

首先,“免票潜规则”是以损害大多数游客的公平权利和政府公信力为前提的。景区应该属于一种公共资源,游客理应享受到公平的旅游服务,岂能厚此薄彼,搞门票歧视。有人堂而皇之拿着“免票单”,还有人全程陪同、护送,这种特权怎能不叫人眼红;而景区最后还会把损失转嫁到普通游客的头上,抬高门票价格,又怎能让人心平?从这个角度讲,如果景区门票潜规则不改,即使打人城管被查处,他们也不会服气,而景区也仍然没有底气拒绝“特殊游客”。

更为重要的是,“免票潜规则”是一种明目张胆的腐败行为。对于享受到免票待遇的干部来说,一张几十元的门票或许数目不大,但是对一个景区来说,若干个“免票”造成的损失就是庞大的,会让景区苦不堪言。而且,全国有多少景区在执行这样的“潜规则”,旅游损失知多少?这种“潜规则”的最终结果,其实是造成了国家的损失。

现在的问题是,这些能要景区“免费”的人多是景区得罪不起的主,他们可以动用手中的权力或者某种撒手锏,强迫景区就范。对于吃惯了“门票白食”的权力部门来说,我们不能指望他们“良心发现”,自动放弃既有特权。个案查处只能解决个案问题,根本之道还在于严格权力监督机制,痛下决心铲除“免票潜规则”的土壤,让景区有底气对“免票潜规则”说“不”。

此外,在“潜规则”一时半会儿难以打破的情况下,给舆论监督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也十分重要。不妨让媒体经常来曝光,看究竟是哪些人在景区吃“霸王餐”。

社保法需有前瞻性突破

其一,应按照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方向,提出全民社保的思路。在设定的期限内,逐步取消社保双轨制或多轨制,实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社保的对接,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和企业社保的对接。我认为,社保法应把农民纳入社保范围,实现参保对象的最大化。全民社保,不分城乡,不分等级,才能充分体现社会公平,构建和谐社会。

其二,按照社保法草案规定,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省级统筹,其他社会保险基金实行省级统筹的时间、步骤,由国务院规定。这虽然比原来前进了一大步,但还不够彻底。尽管草案也提出要“逐步实行全国统筹”,但这个“逐步”没有明确的期限,容易成为拖延和“慢慢来”的托词。我认为,修订稿应该像制定五年、十年发展规划那样,提出

用多长时间实行全国统筹。有了明确的时间目标,才会产生压力、激发动力,从而大大加快全国统筹的进程。

其三,参保、取保的时间门槛要降低。劳动者参加养老、医疗、失业三险,此前都有较高的起点时间限制,达不到一年或半年时间,就不够参保或取保资格。以广州为例,前不久当地政府透露,失业保险基金结

余了85亿元,而每年失业保险的支出仅为3~5亿元。也就是说,仅结余的失业保险基金就足以应付好几年了,因此,当地决定大幅下调失业保险缴费比例。然实际上,到广州打工的农民工流动性很大,许多人失业后由于达不到规定的取保时间,则领取不到失业保险。因此,社保法修订稿应该作出改进,比如可否将参保、取保的时间门槛下调为三个月或一个月,让更多劳动者可以从中受益。

总之,社保法不能仅仅满足于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,而缺少强身健体、延年益寿的新内容。作为一部影响重大的法规,它还需拓宽视野,立足长远发展,实现前瞻性突破。

调查“送礼清单”
从突破“某”字始

■吴龙贵

南京一玩具公司2007年春节礼品发放清单意外曝光。清单显示,这家企业共向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送礼14.48万元。一位知情人称,“这些都是政府实权部门的有用人物,年关,年关,不打好节礼,来年别想安生”。江宁区纪委已就名单所涉及

的送礼问题展开调查(12月29日《新京报》)。

12月17日揭晓的《新周刊》年度新锐榜上,简光洲(《东方早报》记者)当选“年度新锐人物”,理由是他在报道“三鹿奶粉事件”时,第一个点出了“三鹿”这个品牌名称,而此前,许多媒体的报道都是以“某”品牌代替。有媒体称,简光洲的成功,就在于打破了一个“某”字。

打破一个“某”字有多难,阻力有多大?眼下最为舆论关注的“送礼清单”事件或许能给出现实的解答。此前的报道称,“这份春节礼品单显示,佳事得2007年春节送礼40多笔,每个收礼者的姓名都清清楚楚”。而在后续报道中,媒体公布的这份清单所涉及的官员,仍以“某局长”、“某官员”代称。

虽然这份礼品发放清单是意外曝光,但企业在年关向政府官员送礼的现象却并不令人意外。因此,这一事件的最大意义在于,它暴露了“节日腐败”的潜规则以及我们的防腐反腐制度和体制内监督的疲软,同时也体现了体制外监督,也即社会监督的价值。因此,无论结果是否属实,将这份名单公之于众,都是积极回应舆论监督的重要一步——要么它是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,要么可以体现政府的反腐决心。

然而,一个“某”字,又让一切回到了原点。在“某”字的掩盖下,事件真相仍然处于未明状态,公众仍然只能猜测和质疑;在“某”字的掩盖下,相关部门仍有很大的回旋余地,可以随着事态的变化而自圆其说,以取得对自己最为有利的结果;在“某”字的掩盖下,反腐仍不能突破现有的制度困局,停留于“打到哪算哪”的低级阶段。

能不能突破这个“某”字,不仅在于媒体有没有这样的新闻良知和勇气,也在于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舆论环境、制度环境。针对近日网络出现的与南京有关的几个热点事件,南京市委书记表示,网络的快速兴起,使党员干部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都置于媒体和群众的监督之下、评说之中,党员干部要经得起网络监督。而这一切,也许就要从突破这个“某”字开始。



配图:俞柏鸿

观点 PK

【新闻事件】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分组审议统计法修订草案时,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吴晓灵认为,基于统计科学性的欠缺和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观的扭曲,应该取消地方政府 GDP 的统计。

正方

取消地方 GDP 统计可以一试

■林卫萍

地方政府 GDP 的统计“注水”是老生常谈的问题。2006 年上半年,全国各省区市所报 GDP 之和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相差了 8048 亿元;2007 年上半年,全国各省区市所报 GDP 之和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相差达 1.2464 万亿元。多位专家表示,造成 GDP 双版本除了技术层面的原因之外,主要还是地方报送统计数字时层层加水。

地方报送统计数字层层加水,其实很好理解,因为这关系着

自己的政绩,也关系着自己的政治前途。在“官出数字,数字出官”的背景下,想要杜绝注水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而注水的地方 GDP 除了粉饰地方官员的政绩之外,还有多少实效性?在我看来,既然地方 GDP 统计已成为一个“美丽的谎言”,何不取消试试?

对地方的政绩考核当然是必要的,问题是如何考核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吴晓灵建议,地方只管卫生、教育、就业、环保这些硬性指标。笔者以为,只考核这些硬指标,更有利于地方政府树立正

确的政绩观,有利于将民生问题放在首位。

不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。继国务院推出 4 万亿元刺激经济方案后,各地政府也先后公布了各自的投资计划,根据对目前已公布投资计划的 24 个省市的统计,投资计划总额已经接近 18 万亿元。这巨大的悬殊中难道没有注水的成分?而在这么多的投资之中,又有多少是向公共领域倾斜的?

因此,如果取消地方政府 GDP 的统计,能够促进对地方政府的考核科学化,不妨一试。

反方

GDP 统计不必取消但需“打假”

■苑广阔

以笔者在单位从事过统计工作的经验来看,统计方法的不科学是完全可以避免的,统计方法的科学合理和统计数据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,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。现在最难解决的,就是地方领导干部出于政绩需要而人为篡改、编造统计数据的问题。

GDP 和官员政绩挂钩,而官员的政绩又和升迁挂钩,甚至成为决定官员是否能够升迁的主要依据。在某些地方官员的眼里,GDP 数据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任由自己揉捏摆布的面团,当他们

需要 GDP 数据变大、为自己捞政绩的时候,GDP 数据就会变大;当他们需要 GDP 数据变小、为地方争取国家补助和扶持的时候,GDP 数据就会变小。各级政府 and 单位的统计部门,不是对统计真实性负责,而只是对领导的需要负责,这是地方 GDP 数据失真失实最根本的原因。

其实,一个国家和地方的 GDP 数据,可以直接反映很多问题,是中央和地方制定发展方针和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。完全取消地方 GDP 统计数据,不如采取措施让其彻底规范起来。也就是说,取消不如“打假”,挤出水分,

打掉虚假成分,以求最终数据的真实和客观。

GDP 统计数据如何“打假”,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,但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大对那些在 GDP 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官员的处罚力度,让其不敢造假、不敢掺水。有调查数据表明,统计法实施 25 年来,处罚官员的最高级别是县级,县级以上的官员没有人受到过处罚。即使是这些“不幸”遭到处罚的官员,所受处罚也是很轻很小的,基本处于“下不为例”的程度。如此宽松的造假环境,如此轻微的处罚力度,难怪官员对于 GDP 数据造假会乐此不疲了。